

永生的桥

□朝颜

进入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境内,迎面就是两棵巨大的老樟树。阳光从叶隙间调皮地钻出来,轻手轻脚地爬到两位歌唱老人身上。一位老人一边归整着脚边的一堆樟树寄生,一边好奇地瞧着我,蛮有把握地问:“你,是来看桥的吧。”我点头,她朝左手边转过脸去:“喏,就在那。”

是的,我要来看的武阳桥,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,一座注定要被载入中国革命史的桥。只是,原来的那座桥已经不见了。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雄壮地横跨在河面上,桥墩结实,两车道的桥面宽阔平展。那是1988年,武阳镇人民政府为改善沿河两岸交通而修建的。桥头立了一块“红军长征第一桥”纪念碑,永久地镌刻下红军长征的往事。

我望着滔滔奔流的河水,想象着从前那座桥,那些人,那样一场义无反顾的先行。风掠过草木,吹上身来。这时候,我的脑海中不由回荡着《十送红军》的旋律:“一送(里格)红军,(介个支)下了山,秋风(里格)细雨,(介个支)绵绵……”然后,沉浸于一种哀伤的情绪中。

关于那座桥的模样,我只在一张黑白的资料图片上看到过。那是一座简易的木板桥,全长一百一十多米,宽不足一米。十三个木桥墩单薄地跨坐在河中央,二十多块木板简陋地铺在桥墩上,和宽阔的水面以及岸边巨大的老樟树比起来,它显得那样轻飘,那样不稳固。

故事来自老人的讲述。那时候是深夜,从福建汀汀中复村赶过来的一万多名官兵来到这里,队伍后面是随时有可能追上来的敌军。仅凭小木桥那单薄的桥身,根本无法承受一支队伍的急行军。桥上的人多一些,行走得快一些,桥体便摇晃得厉害,一副随时都要垮塌的样子。可是分批过河,速度又太慢。

火把照亮了武阳村的夜空,红军战士的说话声,咳嗽声,木桥板的吱嘎声,惊动了附近的村民。一些胆子大的村民循着火把和声响,好奇地来到绵江河边,不由大为惊讶:“这是红军,是我们的军队呀。”1930年8月,武阳区成立,区政府设立在武阳村,当时武阳村有九百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。村民们送出了自己的亲人,如今看到红军队伍,就好像看到了亲人一样。

了解了红军所面临的困难后,地方干部曾光林和邹光林分头挨家挨户进行宣传,动员乡亲们拿出床板、木凳、布包、油桶等物品,用来拓宽加固桥面,帮助红军过河。

红军队伍要开拔了,村民们又急切地送来煮鸡蛋、米果、炒豆、花生,塞进战士们的手上。还有的送来草鞋、斗笠和蓑衣,让红军战士们带在身上。

可是,大部队过河时,桥身仍旧摇晃得厉害。村里上百名上了岁数的男人,纷纷跳进河中,分别站在桥身的两侧,用身体顶着晃动的桥墩,用肩膀扛着不稳固的桥板,确保红军官兵顺利过桥。

这是一座坚强的人桥。十月的赣南,天气已经微寒,凌晨的河水浸漫身躯,凉意足以从皮肤沁入骨髓。可是,他们咬紧牙关,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腿站麻了,肩膀磨出泡了,有的人半个身体失去知觉,僵硬得不能挪动。但是没有人喊累喊苦,没有人退出人桥。他们只是深情地望着红军远去的方向,就像是送别自己的亲人。

如今每年的清明和端午等节日,武阳镇的中小学校都会领着孩子们来到渡桥旧址,追忆革命先烈。听说,学校还将乡亲们帮助红军渡河的故事编成了校本教材,孩子们全都耳熟能详。在端午节,武阳人会在武阳举行龙舟竞渡,在锣鼓和呐喊声中,用力量和速度重温当年武阳男儿的英勇。

更多的人来到这里,寻觅着当年红军渡河的踪迹。人们一遍一遍地探究着,一座用血肉之躯筑成的人桥,曾怎样见证着军民鱼水情?那些几乎一无所有的乡亲,为何如此信任着这支队伍?如今,时间已奉上了所有的答案。现在,武阳镇政府正计划着在原址上进行修复。我想,无论它是否原貌重现,都已经是一座永生的桥了。这座永生的桥,留下了太多值得深思,又无比朴素的真理。

看到有村民正攀在屋顶忙碌,将房瓦揭开,把腐朽的椽条、檩子拆下。张扬善解释说,这祖祠建筑的年代和“九世伙居”差不多,也有200多年,长期不住人,瓦面常常漏雨,木构件很多都已腐朽,眼看就要坍塌了,村民凑钱,打算将整个瓦面换成水泥瓦,也换掉一些梁柱。“祠堂的主体还是尽量不动。”张扬善指着墙上依稀可辨的红军标语说,“你们看,这些标语都还在。”

所指处,祠堂西面约4米高的墙上,用石灰浆写着斗大的标语:“白军替军阀当炮灰 红军替工农打仗”,标语气势恢宏,横贯整面墙壁。

说到标语,还有故事。当年,成千上万红军在祠堂借宿,虽然地方党组织事先打过招呼,老百姓还是紧张,怕不好相处,一不小心得罪当兵的。几天后,看到红军纪律真的好,不欺负人,像挑水、劈柴、扫地搞卫生之类的事情,都是红军战士包干了,老百姓就开始真心拥护红军,看见居住在此的红军三军团下辖红八军6师政治部的人员写标语,祠堂里的群众也搬凳子、递扫帚、借楼梯,主动上前帮忙。

红军写标语,日日有村民围观。有的村民看着手痒痒,也来写标语。有一条标语蛮有味道,是村民写的,把彭德怀的名字都写错了,写成了“彭德还”。

张扬善兴致勃勃,又带众人绕过大水塘来到一座祠堂。“这一栋房屋叫‘九世伙居’,是乾隆年间建造,距今250多年,算得上文物了。”祠堂分上下两进,张扬善领着众人绕过天井往上厅走。上厅左右两面墙壁,白色的青灰已经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变成灰白,斑斑驳驳都是标语。仔细辨认,左墙靠立着的禾秆、竹耙等农具之间,清晰可见一行歪歪扭扭墨汁竖写的标语:“欢迎军长彭德还(怀)”。

“这条标语的写作者是谁呢?!”从熟悉程度、书写水准来看,写作者可能是一名识字班或农民夜校的初学文化者,是一名苏维埃乡村干部或少年先锋队队员。大家推测,写作者很可能是一个名叫张华诚的人。张华诚土生土长在韶坊张家宗祠,是最早的小布区韶坊乡少年先锋队干部。几次反“围剿”,他积极参加上级布置的各项支前工作,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,还是上夜校学文化,都起到带头作用。尤其是在乡里工作期间,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,他书写过许多红军标语。张华诚1934年7月参加红军,长征路上三次负重伤,曾任某部团长,陕北独立支队支队长、北密军区兵站政委、华北军区后勤部办事处政委等职,离休后,1986年在银川病逝。

还有一个推测,标语的书写者更大可能是陈方仁。陈方仁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住在几百米外的木坑村小组,那边有6座陈氏宗祠。那些祠堂,也曾林林总总,有许多红军标语。

陈方仁敢把标语写入张氏祠堂是有原因的。他1919年出生,年纪比张华诚小一轮,13岁参加革命,担任了洛口县小布区韶坊乡共青团团支部书记。那时的他,天不怕、地不怕,但凡上级下达命令,他都冲锋在前。虽然在夜校里识字不多,字也写得不好,却“胆大妄为”,书写了不计其数的红军标语,留下不少错别字。1934年5月,年方15岁的陈方仁便参加红军,在红三军团五师卫生队当司务员、陕北游击大队二支队特务员。17岁那年,他战斗中与部队失散,流浪漂泊在四川黄金县黄金乡一带打土工。新中国成立后,陈方仁返乡,回到这片土地,耕作劳碌,担任过生产队长、村委会主任……

张、陈两人,究竟是哪一个呢?面对我的追问,张扬善笑了,布满折皱的脸上露出几分羞涩:“我还不能肯定。”

木板隔墙上。这是闽西第一家红军医院,傅氏祠堂有200多年历史,建于1722年,系土木结构,平房,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,群山环抱,古木参天,空气清新,既便于伤病人员疗养,又便于隐蔽。

那天,行走看望中,红四军政治部部长江华一行人注意到了书写在病房木板墙上的诗,停下脚步看了一遍,又饶有兴趣地读了起来,此时江华身旁已经围了一大群战士,大家纷纷笑着指着躺在床上的一名伤员:“是他写的,他叫姜立生——”

姜立生腹部受重伤,手术后已经在好转中,他挣扎着立起身子向江华等人敬礼。江华笑眯眯地走到姜立生面前,拉着他的手,同他亲切地聊天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,是哪里人?”“我是江西宁都人,叫姜立生。我原来叫姜贤文,今年春报名参加红军时改了个名字。我们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嘛,我就拿共产主义的‘产’字拆分开来,改名叫作立生的。”年方十八的姜立生虽然略带几分羞怯,但说话倒也干脆利落。

“名字里面有理想有信仰,改得好嘛。”江华轻轻拍了拍姜立生的肩膀,爽朗地说:“小老表,你的诗写得不错哟,以后多写一些宣传宣传。我们的红军应该这样,不要因为一时带花、生病就垂头丧气,要提起红军精神,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,你们看我的气色如何?其实我也是病魔缠身,我们可以说是‘同病相怜’。身体当然重要,但精神支柱更少不了的啊!”

喜爱诗的人,在哪里都能找到诗的轨迹。回到家乡后,姜立生立即参与组织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,黄陂区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,成为宁都县最早完成分田地任务的先进。1931年9月,姜立生升任黄陂区苏维埃政府主席。令人始料不及的是,随着反“围剿”形势恶化,苏维埃政府进入游击状态。在一次转移到黄陂区偏远的南坑村时,姜立生被一个坏人认出告密,遭敌抓捕杀害。

墙壁上的红军史

留在墙上的文墨和颜色,都成为可圈可点的红军史。

红三军团来宁都的第一站,就是小布镇木坑村韶坊村小组。韶坊,是红军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由退却转为进攻的一个重要节点。

当时,红一方面总部设在11.2公里外的黄陂,打头阵的红三军团则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了韶坊。苏区时期的韶坊是一个乡,集市繁荣,三条商道在此会聚:向西不到一公里是小布,从小布翻越雩山就是永丰;向东北是洛口,再向前是广昌;向东南是黄陂,顺流而下可达宁都县城。韶坊,可以说是一处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,是对敌作战第一道屏障。

“韶坊现在只有8栋祠堂了,可当年有21栋,全部是张氏祠堂,住满了红军。”韶坊村党支部书记张杨峰对于往事,如数家珍:“我们客家人,本地的祠堂有两种类型,一种是族祠,只供奉祖先神灵,平时不住人;一种是众厅,族中的分支所盖,厅堂比族祠小,厢房却比族祠宽阔,要住人的。红军不扰民,指挥机关一般驻扎在族祠,而部队战士就在众厅的厅堂里打地铺。”

张杨峰一边讲,一边领着来访的众人进入一棟祠堂。见有客人进来,一位70多岁老人起身热情招呼。老人名叫张扬善,从小住在这里,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。他说,红三军团是1930年12月1日来韶坊,住了半个月,12月15日又机动到东山坝坪田。“那次红军在这里住了十天,红三军团的军团部就驻扎在村中间的仲霞翁祠,天天都出队练兵。”

仲霞翁祠是一座张氏祖祠,我们赶过去时,



红军不怕远征难 熊伟明作

的一部分右腿。因为缺医少药,消炎用的盐水连食盐都没有,就用硝盐。硝盐怎么能够消炎呢?他腿上的伤口感染了,医生又锯下他一截因感染生蛆的右腿。“北佬”拄着拐杖,拎着用布包裹着的截腿,又埋葬在这里,并在“坟”上插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墓碑。

死亡不是永别,遗忘才是。不断地转悠,悼念也在不断地延续。“北佬”悼念逝去的时光,悼念整个团、师,悼念红十五军,红五军团,也悼念自己。人们看到标语时,“北佬”早已离开蜡烛寨。“北佬”只留下这幅神秘的标语,生卒年不详。往事如烟,就那么轻飘飘地散逸了。

六十甲子一轮回。2002年,会同村下村小组村民开发果园,推土机轰然震撼山谷,发现大量烈士遗骸,修路时又发现这幅崖刻——“红十五军”。四个字凸起的部分,长满绿茵茵的苔藓,球形绒毛颗粒在阳光下闪耀,格外引人注目。四个大字,在旷野中迎风伫立,对人的遗忘是一种唤醒:这里有几百、上千“北佬”坟冢。

2014年5月,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”在此建成,耸天而立,与两座蜡烛峰形成天作之合。

用标语吹响革命号角

一位伟人说过,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,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。红军始终不渝致力于文化教育,写标语就是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。许多红军战士就是从读、写标语开始识字,学习革命道理的。

可以说,红军标语是革命号角,是战斗宣言,还可以是诗。福建上杭蛟洋镇石背村的傅家祠堂,便有一条独特的标语诗:

我是赣南宁都住,真正革命到这条路。军长下令要包围,一心打倒陈国辉。走上马路连冲锋,反贼尽死江河中。我军得胜希望大,陈贼全部都失败。心在革命不在家,谁知龙岩带了花。我仿非小不相当,副官吩咐到后方。总要共产到成功,我辈青年把田分。

姜立生提笔

据说,那天,恰巧被爱诗又重视标语的红四军政治部部长江华一行遇见,他兴趣大发,仔细一看,又饶有兴趣地朗读一遍,读完后连连称赞,追问作者是谁:“好,好,写得真好!这是谁写的呀,作者现在在哪里呢?”

其实,标语诗后面有作者落款,前面则有段引语,作者详细介绍了自己身份及写作缘由:“我们是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士兵驻在此数十天,多蒙蛟洋各位同志恩泽,招待我们比如兄(弟)手足更好得多。”

散落乡间的红军标语,大部分属匆匆军旅间的随意笔墨,而这首书写在灰色木板上的叙事诗标语却别具一格,以工工整整的楷书撑起“诗文并茂”的评价,成为国家一级文物,如今珍藏在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。

今天,面对这条标语诗,我陡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冲动。因为,开篇第一句,诗中便标明作者是我的老乡,阅读中脑海电光火石般闪出一个念头:寻找姜立生的下落。

寻找一个9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?当将想法付诸实施时,我自己都感觉离奇,近乎荒唐,免不了自嘲——就当幽默自己一把或游戏自己一下吧。

我查阅了《宁都英烈谱》,有名有姓之16742名烈士英名录,均无功而返。于是拨通了宁都县党史办曾春生的电话,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。出乎意料,曾春生竟然知道此事,他在电话那头笑嘻嘻地回答:“别说你看了这首标语诗想找到姜立生,许多党史专家看了这首诗也想找姜立生哩!”他介绍了有关情况,还专程带我前往采访姜立生的后人。

这个姜立生,真是黄陂镇连陂村樟垵组人。如我所料,姜立生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,但比我想象的更苦,也比我想象的更能干。姜立生是独子,幼年丧母,父亲姜启狮对其疼爱有加,坚持不续弦自己养着他。姜立生念过几年私塾,终因贫穷辍学,跟着父亲耕田种地,农闲时兼做纺织夏布手工艺。在慈父的培育下,姜立生性格活泼,好动好学,样样农活都会,样样手工艺精通,尤其是父子俩纺织的夏布,绵柔细密,均为上等品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1928年春,姜立生开始参加革命活动。1929年2月,红四军领导人路过连陂村时,接见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。红四军一路上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入耳入心,更加坚定了姜立生的革命意志和决心。

1929年4月,红四军和地方武装攻占宁都县城。随后,成立中共宁都临时县委、县工农革命委员会。此时,姜立生碰巧到县城卖夏布,目睹了红军把打土豪得来的钱粮谷物分给穷苦兄弟。不是亲人胜似亲人,深受感染和鼓舞的姜立生,把卖夏布的钱托人捎给父亲,家也不回当即在县城报名参加了红军。

那时,出征者都有一种决绝:捎个口信回家,人就像子弹射了出去。1929年5月16日,姜立生随部离开家乡,踏上了进军闽西的征途。部队到达闽西后,姜立生入编为红四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战士。6月19日,红四军三打龙岩城,姜立生所在的纵队主攻城西。是役,红四军按计划攻克龙岩城,守敌陈国辉部全军覆没。

姜立生在攻打龙岩城时身负重伤,被送往福建上杭蛟洋镇医院医治。蛟洋镇地处梅花山边缘,是通往新罗、连城、上杭三县的接合部,境内有风景秀丽的双髻山,建筑奇特的文昌阁。

姜立生性格乐观,爱说、爱唱,整天闲不住。上级领导交代他手术后养伤恢复一段时间回家,他想着即将离开部队,便琢磨着把参加红军后及三打龙岩时一路所经、所见、所闻、所思,写成一首能歌能诵的诗,工工整整书写在

满街「红」

□卜谷

红军一到满街「红」,等于过年。

南方冬暖,四季常开。行走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广袤的原野上,常有一股发自土地、溪流、山林深处的浩荡之气扑面而来。透过浓荫遮蔽的古村落,远远地,能看到几许亮色,召唤、吸引你向她凝眸、靠近——那是当年无处不在的红军标语。

在赣南原中央苏区,尤其是当年的全红县,一座座村庄,一幢幢屋宇,就是一座座标语博物馆。屋场外墙、内壁、楼阁、门窗、隔板、木桥、船板上……随处可见红军标语,甚至在几处贴墙脚的木板、砖头上,我曾看见几行歪歪斜斜蝇头小字的标语,此情此景,令人感动。我能想象,这是战士当年打地铺、临睡前躺在稻草上费劲吃力留下的杰作。

“红军一到满街红,等于过年。”1929年红四军向中央报告红军状况时说:“红军到一个县城只要三个小时,宣传工作可以普遍……”各式红军标语,看似普通,却发自心声。

天地之间有大碑

星星的坚守,最终点亮了黎明。一条崖刻红军标语被疯长的草木遮蔽半个多世纪,终于显露出了峥嵘体态,虽然仅有四个字——红十五军。

不是用笔写,而是用刀刻斧削。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,最工整,最有气势,最刻骨铭心的红军标语。这幅标语,承载着红军一个军乃至一个军团的命脉,其人其事,令人揪心撕肺。那么多年过去,一经撩拨,我便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

这幅标语的位置相当特殊,地处宁都县会同乡会同村偏僻的下村村小组。下村背后有两座对称的山岗,山体巍峨而峰顶细长,状似蜡烛,远远望去,宛若两支向天而燃的“天烛”,因此,下村又被当地人称为蜡烛寨。

天造地设,两支“天烛”之前,一方峭壁突兀耸立,似天降陨石,形若一块大碑。碑正面镌刻着“红十五军”四个一米见方的大字,如一枚枚印章,字体为庄重肃穆的阳刻隶书,巍峨之势,犹如直面泰山。

莽莽苍苍的旷野中,“天烛”日夜不熄,“大碑”任由日晒雨淋,“红十五军”像一座历史丰碑,默默祭奠着山野间无名烈士的英灵。

无名烈士,原本都是有姓名的。

据当地老人讲述和有关资料记载:1932年,下村曾设有红军野战医院,主要医治在前线战斗中英勇负伤的红十五军官兵。由于缺医少药,医疗条件差,重伤伤员牺牲后,会就近安葬在此,从庙岭上至四方土之间近万平方米的范围,竟有数百名红十五军将士的墓葬。

1934年夏秋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,原红十五军野战医院熟门熟路,再度“光临”下村。实际上,此时红十五军不复存在,因战斗频繁大量牺牲,这个军已经缩编为红13师旗下37团。

高虎脑激战后,红五军团第13师,驻扎在广昌驿前通向宁都的铁掉山,刘桂峰等阵地,像一把铁锁卡住通往宁都的关隘。1934年8月29日,他们连续击退敌军四个师的进攻,伤亡300余人。会同乡群众在当地苏维埃干部的带领下踊跃支前,男女老少齐上阵,自发组织担架队、洗衣队,配合红军反“围剿”。担架队从红13师37团阵地,抬回大量伤员及牺牲的战士来到下村。

这回,下村的群众更有经验了,迅速腾出厅堂、住房:刘屋祠堂建医院,叶屋祠堂设病房,家家户户接受伤病员……宁都县党史办提供的资料记载:为解决伤病员缺医缺粮问题,红军在当地筹集稻谷三百多担,银圆二万多块。

名曰野战医院,实际也就三五名医生,七八个护士,更多则是当地临时征来的看护员、洗衣队、工勤人员……设备就是几把手术刀和消毒的铝锅,桌案就是手术台,简陋到极致。伤势严重者大多难以救治,每天有十多名伤员相继牺牲。不到半个月,牺牲者100多人。牺牲人员,照例由当地村民用一块床板,抬到村后四方土坡上掩埋,最后由战士“北佬”插上一块写有名字的木板作为墓碑。每次下葬,“北佬”都会拄着双拐一跛一跛挣扎前往,坚持着一项极简单极圣洁的仪式,完成对每一个生命最后的祭祀。

“北佬”写得一手好字,那些墓碑上的名字就是他一笔一画、恭恭敬敬书写的。都说“北佬”是团里的书记官,与那些烈士朝夕相处过六七载或十几载,他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,据说丝毫不差。

一块又一块,“北佬”亲手插了一百多块木头墓碑。他随手掖着一把锋利的匕首,在坟头戳个穴,双手使劲将墓碑直插上去,再用石块砸向深处,添上一抔土又一抔土。插墓碑时,“北佬”特别虔诚,恭恭敬敬单腿跪拜。

单腿跪拜,是因为没有双腿。“北佬”把自己身体的那个部分——一条腿也埋葬在了这里。分两次埋葬,第一次是医生锯下了他已经炸烂